

# 当代浙商的人文精神

李建华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中心, 浙江杭州 310035)

**摘要:** 人文精神是理解当代浙商发展和崛起的重要主题。理解当代浙商人文精神, 需要从自然地理特征和历史文化传承、近现代发展历程和西方经验等角度去把握。当代浙商人文精神是丰富的和多样的。当代浙商人文精神发展应当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契合, 并为浙商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 浙商研究; 人文精神; 企业发展; 管理革命

**中图分类号:** F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154 (2008) 02-0010 - 06

当代中国的民营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中发端和萌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和壮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中崛起, 在 21 世纪初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近年来屡屡兴起的经济热点中展现其力量并被认识。当我们对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回顾和探讨的时候, 当代浙商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不可忽视的主题。浙商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 可以说, 如果离开当代浙商谈论当代中国民营经济, 很难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中深刻的变化。

## 一、浙商人文精神: 问题的提出

为什么当代浙商能够成为在当代中国社会 30 年发展中崛起和突出的一个独特群体?是浙商研究难以回避并且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这里, 人文特性是理解和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在浙商崛起的背景和条件中, 社会经济背景、政治体制、政策环境等, 中国大陆各地没有根本性差异, 但是, 人文特性的积累和变化则是需要一个足够长的历史时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地域特征的人文属性, 为理解当代浙商崛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视角。

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当代浙商创业者, 通常从低层次的小商品领域开始起家。产生于千百万普通百姓和“草根社会”的当代浙商普遍起步比较低。费孝通曾称道由“八仙过海”的温州百工匠人和挑担货郎发展成为生产组织者、供销组织者、经纪人和区域间产销组织者[1]。吕福新用“个众”描述浙商基本特性, 提出关于浙商研究的主体性分析范式[2]; 张敏杰讨论了开明政府、重商传统、创业精神和集群效应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3]; 陈学文强调地理特征和传统对现代的影响[4]。

尽管大多数学者公认, 人文精神是当代浙商的重要特性, 也是理解当代浙商崛起非常重要的视角, 然而, 关于浙商人文精神的研究远未在概念、方法和主要内容上达成共识。这里有必要就这一主题的若干基本问题做出必要的规定。首先, 就研究对象来说, 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浙商, 既不是历史上的也不是未来的, 准确地说, 是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时代背景的; 其次, 强调人文精神而不是其它特性, 人文精神反映特定人群普遍的社会文化特征, 包括但更要超越商业领域; 再次, 研究目的主要在于为理解近 30 年来当代浙商崛起的事实提供重要视角, 这里需要考察历史进程对现代的影响, 但不是历史研究。最后, 无论是历史上浙江各地的商帮还是当代各地浙江商人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丰富了浙商的人文精神, 对当代浙商人文精神的概括既要足以含盖浙商的总体特征, 它必须是鲜明而不是含糊的, 更要容纳浙商人文精神的多样性。

人文精神是浙商成功崛起的原因, 浙商人文精神根基于浙江民间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是社会历史性、人的主体性以及文

化性的有机统一和结合。吃苦耐劳、勇于开拓、求平等、善变通、谋发展，既是浙江人日常生活行为理念，又是浙商人文精神的体现。

人文精神是长期积淀而不是短期形成的，每一个时代所发生的历史性事件都会为人文精神注入时代特色，并形成人文精神发展。理解当代浙商人文特性，需要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传承背景下、在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和工商业文化发展历程中、在与西方世界的比较中进行考察。当代浙商人文特性研究，应当面向当代浙商的现实和实践，并为当代浙商的未来发展所涉及的普遍问题提供前瞻性、战略性的分析和预见，力图给出切实而富有远见的建议。

## 二、浙商人文精神：自然地理基础和历史传承

与商业崛起和迅速的财富积累相比较，人文特性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期的，更多地体现历史积淀和累积惯性。在特定政治或者行政力量支撑下的商业精神的释放，往往更多地取决于来自历史传承的人文精神。

当然商业文化也是形成人文特性和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近现代世界，商业实践和商业发展对人文精神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极为重要、极为深刻的影响。理解当代浙商的人文精神，必须从历史传承中把握，尽管当代浙商也在发展着新的人文精神。

除杭嘉湖平原地区外，多山、临海、水丰、地少大致可以概括浙江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杭嘉湖平原长期以来都是富庶的“鱼米之乡”，有意思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浙商，主要地和领先地出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杭嘉湖的算不上富庶的温州、宁波、义乌、台州等地。许多历史经验似乎也可以说明：近现代经济发展中后的后起之秀，往往并非崛起于传统经济繁荣发达的基础之上。当代浙商再度展现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低山、临海但物产丰富，大概是形成浙江人文精神独特性的自然地理基础。在次等生存环境下的人们当然地也是不得不养成了勤劳、敬业、诚恳的品质，劣等耕作条件促使一些人脱离“以土地为生”传统转求经商或者实业，在缺少资源条件下发展工商业，又培养和自然选择了浙江人精明能干、机敏灵活、吃苦耐劳、务实以及敢做敢为、胆识过人等商人品质。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养成的这些人文精神，支撑和推动着当代浙商的形成与发展。温州商人正是从石刻、竹编、弹花、箍桶、裁缝、石匠、理发、厨师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的生意起步，率先走出本地、走向全国乃至后来走向海外的。这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对商业发展和当代浙商萌芽所发挥的基础和先导作用。

在先秦文化繁荣时代，经商意识在江浙一带似乎更具独特性，当时商人的典型代表吕不韦、范蠡等巨贾都涉足江浙。“鱼米之乡”不仅盛产生活必需品也盛产丝绸这种奢侈品，与大量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繁荣相适应，商业发展也比其他地区更繁荣。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代，杭州、宁波、温州商人已经在海外贸易方面积累丰富经验。经商和贸易传统，长期地、历史地、潜移默化地对浙江地域人文精神产生影响，也是当代浙商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中国历史上、在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体制内，江浙一带往往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内，远离政治和统治中心，使得商业取向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优先选择，尽管读书求功名作为整个封建科举时代最普遍的追求也深刻地影响着江浙一带的精英才子。那些出于多种原因南迁的士族，一旦在江浙一带定居，选择从商以安身立命、养家立业或著书立说，可能是无奈的选择。一代代南迁士族为江浙商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与欧洲近代工商业萌芽大体相当的明清时期，江浙工场手工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这一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浙东学派倡导的“工商皆本”，已经开始挑战中国传统农本思想。浙东学派不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更为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注入浙江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最重要影响。在历史上，“父母在不远游”的播家传统观念制约着商业文化和商人发展，浙东学派为突破这一传统观念、发展工商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由于浙东学派的贡献，明清时期江浙上流社会对经商和实业的观念

由残商、抑商逐步向惜商、重商、慕商转变。很难设想，没有浙东学派，自明清以来江浙地区的工商业文化会处于领先地位。

### 三、浙商人文精神：近现代发展历程及其影响

众所周知，浙江沿海，近现代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冲突，浙江往往首当其冲。鸦片战争中，英军就是从镇海这个浙江小城打进中国大陆的。此后，江浙地带也是民族资本主义领先起步和发展较好的地区，为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江浙财团曾经是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近代江浙商人积累的从商经验、经历、人脉、网络、声誉等，是当代浙商人文精神的直接来源，对当代浙商有现实影响。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就涉及宁波，宁波是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重要的海外贸易地和通商港口岸之一。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中，西方资本、官僚资本和买办相继在各个通商口岸率先发展起来。在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痛苦而屈辱的过程中，浙江成为近现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源头。大致在 19 世纪中叶到加世纪中叶，浙江的近代工商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获得长足进展，历经百余年逐步深化的工商业精神，已经深深渗透浙江近现代文化。

苏杭是著名的丝绸之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就是由缫丝厂开始的。在 19 世纪末到加世纪前期，浙江各地纷纷出现的“商帮”，率先脱离土地和农业经济，走上发展近现代工商业之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为浙江社会注入了创新观念和创业精神。有家底、有见识的浙江人，走出国门求学西方，把西方技术、工业和生活方式以及人文精神带入中国。浙江人能够为建立中华民国所做出重大贡献，有深厚的近现代人文精神根源和工商业文化、市场经济观念基础。近现代中国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发展演化，无疑是在对传统的反叛和扬弃、在中外比较与融合、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完成的，处于其中的浙江人文精神变迁不过更早、更直接、更显著、更深刻一些而已。

20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奠定了浙江公有经济的基础。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计划体制曾经在中国大陆当然也包括浙江发挥了绝对主导作用。国内外战略环境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浙江并不是中央计划体制重点关注的区域，及至改革开放和确立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战略布局之后，才迎来了浙江快速发展的时期。相比那些公有部门强大的地区，国有经济相对薄弱的状况，客观上为当代浙商成长提供了更优越和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开明的地方政府为当代浙商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

在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农业和工商业繁荣，已经成为支撑封建政权的重要经济来源，封建政权对江浙富商的政治态度兼有利用、维护、促进和控制、压抑、剥夺的两面性。在中华民国时期，尽管江浙大资本与政权关系密切，但奉行“节制资本”的立国原则和拮据的国家财政，仍然没有为民族资本发展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对民族资本的掠夺时常发生，浙商历来具有务实、低调、不好大喜功的商业文化特性，这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时期，曾经频繁发生的政治运动，严重摧残了广大民众的创新和进取精神，也强化了民国以来形成的江浙工商业文化传统。

尽管 20 世纪中期开始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其后形成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曾经消除了这些工商业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在近现代已经融入浙江人基因的工商业精神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精神，其强劲生命力远不能被几十年的计划体制所磨灭。已经渗入浙江人思维深处的工商业精神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精神，一俟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稍有空隙，就迅即迸发并形成强烈的发展冲动，当代浙江商人鲜明而强烈的市场开拓、市场竞争意识，不过是这种人文精神的具体表现。

### 四、浙商人文精神：近代西方崛起的经验和比较

当代浙商发展，以私人企业崛起为主要表现。正是由于私人企业崛起在新世纪所表现的惊人力量，才引发了当代浙商研究。私人企业是近代西方世界的崛起的基础性推动力量，那么，关于当代中国的浙商私人企业崛起与西方世界的历史之间的相似性

或者差异性的思考，有助于洞察当代浙商人文精神的真谛。

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通常是肇始于传统农业条件不甚好的地区，但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也少有在农业条件极度低下地区繁荣起来的。这可能是在人地紧张、生存危机情况下激发的忧患意识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近代西方世界中兴起的地区，往往临海并从事海上探险和贸易扩张。除了杭嘉湖地区以外，浙江多山地区缺乏与富庶的农业文明相伴的广博、平整、灌排设施良好的土地条件，但是，又有比较好的水、肥、光照、温度条件；浙江临海而且有海外贸易的长期积累。当代浙商崛起背景与近代欧美有相似性。

鞋业、皮革、羊毛衫、木条业等，都是在缺乏资源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尽管技术水平、管理状况、产业档次等都处于很低水平，也足以说明浙商在把握机会、适应市场需求、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吃苦耐劳、务实进取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工商业是西方近现代社会内生的。在中国，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工商业文化则是外来的，对西方世界的依赖性、对官僚特权的依附性等，是近现代工商业的重要特征。模仿、引进、学习、赶超，以及对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市场的依赖，使得中国近现代商业文化普遍缺乏主体性、主动性、自主性、创新性等。尽管当代中国大陆奉行体制外改革，当代中国经济成就的许多代表如外资、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力量促动的。相比较来说，浙商发展较少受到政治上的特殊关注，当代浙商更多是在内生发育的市场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为那些白手起家完成从原始积累的普通商人们提供了通过所有权变革迅速实现扩张的历史机遇，当代浙商抓住这个机遇而崛起。

浙商在经营中曾经普遍存在欺骗、产品档次低的情况，但浙江老板少有残酷剥削、粗暴无情对待员工的现象发生，这既与浙商人文特性的历史传承有关，也是当代浙商人文特性中最突出的一个表征。近年来，浙商企业中的外来打工者少有遭受极端恶劣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许多由小商贩成长起来的浙商企业，往往为外来打工者提供不错的至少是尚可的生活设施和生活待遇。这可能是“义利结合”的最好体现。

根据钱德勒的观点，自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依次经历了传统资本主义或者个人企业、企业家式或家族式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分部式结构的出现是现代公司产生的标志，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各国相继完成了管理革命，经理资本主义取代了家族式的或金融的资本主义[5]。在西方，管理革命是与分布式结构取代单一结构、经理取代业主的经营决策权相联系的，这是家族企业向经理资本主义企业转换的两个关键点。西方各国的企业管理革命，受到各国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各具特色。西方社会曾经普遍出现的金融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大陆尚未成为一般现象。

与西方不同，当代浙商企业中，企业家式家族企业、多元化经营和分部式结构、业主高度集中的经营决策权，是伴生的。这既与企业发展阶段也与当代浙商人文精神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以合理推断，在已经准备好的多元化和分布式结构基础上，经理的经营决策权成为即将到来的浙商企业管理革命的唯一任务；当代浙商走出家族企业的历史任务，将集中于企业内部高层经理实际经营管理权的落实。突破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的难题，需要当代浙商展现其时代特征和创造性。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职位放开、股权放开、财务放开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浙商家族企业中初步展现的管理革命特征[6]

## 五、浙商人文精神：独特性和多样性

远离中央集权体制中心、国有企业基础相对薄弱，是在突破计划体制樊篱、体制外增量改革的当代实践中，江浙一带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领先全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个体经营和手艺人特色，顺理成章地启动了浙江私营经济成长过程，一旦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得以确立，浙江私营经济已经在企业机制和适应市场方面有了比其它地区远较充分的经验。浙商崛起更多地体现了体制改革和市场发展的成果，浙商崛起所展现的是新体制的活力，是当代中国大陆最普通百姓表现创造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和融入当代世界经济的伟大创举。它具有“草根性”而难免起步低、档次低；它具有“草根性”而显示了原创性、自主性因而更显示革命性，更能代表市场和自由的发展。

一个比较开明、开放的地方政府，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默认、鼓励、支持、引导、保护，为浙江经济发展和当代浙商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商和谐的局面，可能是解释当代浙商敬业拼搏、克勤克俭、诚信无欺、脚踏实地、富有仁义、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等诸多特性的非常现实的原因。地方政府与浙商相互支持、团结合作，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积极参与全球化合作与竞争。这既是浙江人勇气、胆识和气魄的体现，也是当代浙商的发展和创新。

江苏更多地具有集体经济发展起步的特征，20 世纪末直至 21 世纪初，江苏民营经济在所有制转型和体制转型上花费的时间和成本是大多数浙江民营经济不曾经历的。相比较而言，新世纪江苏发展更多地得益于外资企业和国有经济而非民营经济。珠三角尽管在地理上也远离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但是，珠三角的发展受到中央政治核心的高度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珠三角在当代的崛起是集权政治催生的，是集权政治体制下全国人民支援的结果，带有显著的“树典型”、“树形象”特征。这与当代浙商在市场发展中逐步崛起的基本特征具有显著差异。珠三角或浦东的崛起，除了中央集权体制内政治行为和政治干预背景（从而难免有寻租的嫌疑）外，更多地是由外资、外地人支撑。这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现代企业制度示范。在广东，民营企业兴起之初就与港商、外商合作或相互合作，普遍采用股份制和借鉴港澳或国外管理模式，突破血缘、地缘界限的资本联合，大量雇佣职业经理人，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管理模式很普遍。上海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金融改革方面都走在前列。浙商的家族经营特征更显著一些。

明清以来，中国历史上曾经崛起过不少商帮，其中，以晋商和徽商最为显著。人们容易想到和比较当代浙商和它们的异同。商业文化都与市场发展紧密关联的，商人和市场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尽管晋商和徽商发展在经营管理和开拓市场上有共性，尽管将当代浙商与它们作类比有助于从企业经营的视角提供借鉴，然而，这种比较不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晋商和徽商都是依附于封建经济的，这是它们兴衰的根源。当代浙商发展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为时代背景，这与晋商、徽商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尽管不排除仍然甚至比较普遍存在寻租行为。

当代浙商的丰富实践也展现了其人文精神的多样性。绍兴商人有不响发大财、为人低调、理性、内敛、做事专注不浮躁、敬业、有善心的“师爷”文化特征。走遍全球的温州商人，不管在哪里做生意，总会形成温州商人亚文化群，既具有开放性又有很大的封闭性和局限性，敢为远征和抱团但对外的排斥，是温州的特征。宁波商人，大气、开放、实力雄厚，台州商人股份制发达，浙中商人的多元差异，湖州商人的中和、礼义。这些都呈现了浙商人文特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 六、浙商人文精神：发展的视角

从平民起步、文化层次不高的创业者们，在继承和发扬其人文精神优秀成分的同时，难免不把其人文精神中固有的或者不合时宜的成分传承下来。就其自身来看，知识、学习和修养，是影响当代浙商发展的最突出问题；忽视细节而非严谨、粗放而非科学管理、集中于少数行业的局限等，都与人文精神不无关系。就发展阶段来看，30 年来在劳动供给充裕条件下的低成本积累模式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人文精神，很难继续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发展阶段可持续的支撑力量。就扩张过程来看，浙商在国内外的扩张，都不能回避如何处理与当地环境和公众关系的问题。产生于所谓新经济的新一代浙商，也面临如何将创新嵌入现有社会基础的问题。这些都对当代浙商的人文精神形成挑战。

新世代的浙商，在具体业务、产业选择、资源能力、经营理念等方面，都必须采取新方法、显示新特征。如果说当代浙商应当并能够为其人文精神注入时代内容的话，那么，合作精神、现代观念和更加开放的心态，就是当代浙商人文精神发展的方向。事实上，横店集团提出的共有制思想、义乌经济发展的羊群效应，从“财富浙商”向“人文浙商”转变、从“浙江浙商”向“天下浙商”转变、从“境遇浙商”向“境界浙商”转变，从关注利润到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从假冒伪劣到遵守规则、积极创新，都在发展着当代浙商的人文精神。

看过去 30 年的历史和成就，我们应当承认浙商的优秀；看未来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不仅是中国社会的主题，也是浙商发展的必由之路。很难想象一个不适合人们生活的环境会支撑企业生存发展，很难理解缺乏劳资和谐的企业会有持续

发展。当我们感慨于美国的富裕时，我们不能忽视，工资在美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早就超过了70%。什么是科学发展观、什么是和谐社会，我们应当由此得到些启示。

在今天看来，有意无意地秉承科学发展观、以实际行动默默实践和谐社会理念，与杰出浙商的成长具有高度关联。如果说当代浙商在早期成长阶段往往追逐利润、损害公共利益的话，今天，浙商整体上已经从自己市场实践和历史经验中有意无意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意义。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问题，更是浙商发展必须突破的一个瓶颈。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小商品大市场[J]. 浙江学刊, 1986 (3): 6.
- [2] 吕福新. 浙商转型研究[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6: 3-22.
- [3] 张敏杰. 论浙商转型与非经济因素[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7 (1): 8-18.
- [4] 陈学文. 浙商的历史溯源: 地域、时段、人文基因的交互融合[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7 (4): 3-9.
- [5]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 看得见得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9-10
- [6] 徐炎章. 论家族企业治理优化现实性演进路径 f!].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7 (4): 10-14.